

浅谈政治权力、经济权力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关于世界通史教材体系的一个问题

罗 荣 渠

随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我们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工作也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和新任务,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服务。

就世界史教学和科研来说,我们的底子本来就很薄弱。在五十年代,世界通史的教学基本上是搬用苏联教材。六十年代开始自己编写了一些教材,基本上没有跳出苏联教材的框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盲目排外,大搞闭关锁国,谈“洋”色变,对世界史的教学和科研大加砍杀,使这门学科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倒退了一步。因此,目前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仍然处于同国家的发展和建设不相适应的状态,落后于国内许多科学研究部门,也落后于中国史的研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和不符合世界客观实际;在当前,突出地表现在落后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改进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世界史教学和科研是一个重要方面。现在不少的学校在编写新的教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十分可喜的尝试和努力。

要编写出反映国际先进水平、符合四个现代化需要的新的世界通史教材,首先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打破“禁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思想体系,把被“四人帮”搞乱了一些理论问题以及通过教学实践证明尚未搞清楚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来,通过自由讨论,求得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并敢于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

过去我们的世界通史教材在体系上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解放以来,我们借用苏联的世界通史教材体系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通史教材体系,其中最大的特点是突出了阶级斗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线,来重新编写和重新讲授全部世界历史。这一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实践表明,在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方面,以及在世界通史教材中如何完整地阐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的毛病。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状况的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是这个规律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形式,并且归根结底是受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所制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到历史发展的动力时,总是把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者并举,进行全面的阐释。例如,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

* 本文是根据作者去年十二月初在武汉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关于世界史研究的两个理论问题”的一部分整理、扩充而成。

义一词的含义时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阶级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决定各阶级状况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是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物质基础。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动力；经济条件同阶级斗争条件一样，也是贯穿于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红线^②。坚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和编写世界史，绝不是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在解释这一思想时抱主观主义的态度，而是对历史进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考察它的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把世界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且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研究^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过去的世界史教材中却很少得到全面的贯彻。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红线，往往忽视了经济斗争的红线，抹杀了文化斗争、宗教斗争活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由于阶级斗争被孤军突出，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的“纲”实际上变成了取代一切的“目”。这样，一部内容无限丰富、矛盾十分复杂的世界史，被砍削得只剩下一付“革命”的架子，讲授世界通史，主要是讲古代的奴隶起义，中世纪的农民战争，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帝反殖斗争……。如果说是讲一些社会经济内容或统治阶级的活动，那也不过是作为背景、陪衬、铺垫，或是仅仅为了批判的需要。这种情况在“四人帮”统治时期达到了极点，一般历史专业的教学被砍削为“一论四史”的格局，即政治理论课加上四门历史课（农民战争史、国际共运史、反帝斗争史、党史），作为历史系学生的基本课程。在这种格局之下，只有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革命的国家才能纳入这个世界通史的“框框”之中；甚至连国际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在教材中，一般也只是作为革命的附属物处理。历史的发展本来是愈到现代内容愈丰富，而我们的通史体系却是愈到现代知识面愈狭窄，几乎变成纯粹的革命史。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的概念是相当广泛的，他们谈到过“地理革命”、“商业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价格革命”、“哲学革命”等等广泛的方面。他们认为，只有能够引起阶级变动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社会革命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革命，这包括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而且社会革命不是一次战役，而是在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一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战役的整个时代。但是“四人帮”及其御用的舆论工具梁效之流却按照他们的所谓“三突出”原则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斗争史观和革命观。他们把具有广泛而深刻含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突出到一点，局限于每个社会内部的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有限范围之内；再把阶级斗争的作用突出到一点，局限在被压迫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一个方面；再进一步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突出到一点，而归结为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四人帮”的这个“斗争”史观，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而是一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反党篡权的帮派斗争史观。这个貌似“最最革命”的历史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歪曲，就是片面夸大了政治暴力、政权、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它们夸大到了极端的地步，把政治暴力看成了本原的东西，宣扬暴力决定一切，政治决定一切，政权决定一切。按照“四人帮”的历史哲学构筑成的世界历史新体系，不讲生产，不讲经济，不讲科学技术，单单突出一个“斗”字，斗，斗，斗，斗就是一切。谁要是讲到政治之外还有经济，还有生产，就要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

毫无疑问，这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暴力万能论”，必然要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和权力意志论。

为什么说“暴力万能”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为什么是必然要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和权力意志论呢？对于暴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呢？为了在理论上拨乱反正，为了打破过去苏联的那一套用各国革命史来代替世界通史的老框框，有必要重新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暴力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④把暴力比之为历史发展的助产婆，这个比喻很形象，而且寓意深刻，包含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这句话至少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新社会孕育于旧社会的母体之中；二、暴力对于新社会的诞生只起催生助产的作用。它可以缩短新社会诞生的时间，但如果在旧社会的母体中根本没有孕育有新社会的婴儿，那么，不管多么高明的助产婆，也不管她有多大的力量，也不可能催生出一个新社会来。这个形象的比喻，划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暴力革命论的界限；划分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论同杜林的暴力论的界限。社会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都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新的社会经济因素是社会物质生产的经济规律起作用的产物，不是单纯的暴力的产物。如果在旧社会的母体中没有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出现并趋于成熟，单纯的革命暴力只能引起改朝换代，政权更替，而不能造成真正的社会革命。历史表明，单纯的农民起义，不论它的规模如何巨大，对旧的封建政权的打击如何沉重，也不可能打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来。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论的根据、原动力必须到经济力即社会生产力之中去寻找，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离开了这个基本观点来估价革命暴力，就要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为了具体地分析暴力的历史作用，我们不妨以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的历史为例，略加说明。

一、历史上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发生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旧社会中相当发展之后，革命暴力只是在社会经济前提基本成熟的条件下起作用。而且新的经济条件成熟的程度，归根到底决定了革命暴力对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旧阶级打击到什么程度，以及新阶级所建立的新国家机器和各种制度适应新社会的发展到什么程度。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比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要成熟得多，从而也决定了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比英国革命要彻底得多，激进得多。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社会经济条件的落后性，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相当薄弱。这个革命虽然打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烙印，但革命很不彻底，革命之后长期不能走上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海地，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爆发了震撼西半球的奴隶革命，打碎了奴隶制度的枷锁，但是在种植园奴隶制的废墟上却长期不能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海地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远远落后于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这有力地说明了暴力是一种经济力，只能在既定的经济条件下发挥它的威力和作用。

又比如，西班牙帝国的兴衰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在地球上建立了第一个地跨欧、美、亚三大洲的世界大帝国。再没有比美洲殖民地的征服更能说明暴力在历史上的赫赫成就的了。从美洲输入的大量金银，使西班牙一夜之间成为世界暴发户。但是西班牙的富强不过是虚有其表，它的帝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西班牙迅速衰落

的致命伤就在于，它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与它的世界帝国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它从美洲用暴力掠夺来的源源不断的金银并没有停留在西班牙转化为资本，而是变成黄金的漏斗，流入西欧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靠殖民地掠夺而致富兴国的并不是西班牙，而是荷兰，特别是英国。英国殖民帝国的雄厚基础并不在于它的政治暴力，而在于它的新生的商业资本主义实力，特别是后来兴起的工业资本主义实力。这是英国打败了它的所有欧洲对手而称霸世界的秘密之所在。历史表明，仅仅凭借政治暴力不仅不能长久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甚至也不能使用暴力掠夺来的财富长久地维持帝国的繁荣。

二、资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加速历史的发展，主要在于用疾风暴雨的方式打碎封建旧基础，清除封建旧垃圾，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道路。它的作用主要在于解决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建立，不是靠暴力剥夺的方式，也不是在短暂的急风暴雨年代中完成的。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圈地运动、海盗掠夺与海盗贸易对资本原始积累起过重要作用，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剥夺过附逆的反革命财产，但靠暴力剥夺方式获得的这些财富的数量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自然要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加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绝不能对经济规律任意发号施令。在这方面，近代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比为我们提供了值得研究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十八世纪时，法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至少和英国不相上下，甚至还可能超过英国。法国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许多优越条件：它的幅员广大，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良港天成，面临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它的人口和面积在十八世纪时大约比英国大三倍；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在欧洲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国，掌握并发展了举世无匹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事暴力手段。但是，拿破仑法国尽管拥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它在同英国争夺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的斗争中最后都遭到了失败。导致拿破仑帝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恐怕是拿破仑的没完没了的战争政策，不自量力的大陆封锁政策，无限强化的个人军事专制，这些因素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消极的抑制作用，到最后甚至起破坏作用。英国虽然在幅员和人口方面都远远赶不上法国，政治革命也较保守，但它进行了最深刻的社会革命，特别是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对英国的社会经济进行了深刻的资本主义改造，使英国工业生产最早转到大机器生产基础上，使英国工业品跃居世界的垄断地位。这是英法两国争霸斗争中英国最后获胜的决定性力量。英法争霸的结局，归根到底表明了蒸汽机对拿破仑的权力意志的胜利。

三、资产阶级除了在夺取政权时集中施用强大的暴力外，在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基本建立并稳定之后，一般不需要无限强化国家机器。资产阶级掌权后建立的国家，当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所谓资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国体来说，是指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属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由资产阶级所统治，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但一般却往往误解资产阶级专政必定采取资产阶级的血腥军事专制的形式。事实上一般正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典型的纯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军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官僚制度。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财富权势的统治，这种财富权势的增长不是靠强化国家机器的暴力的一面所可能达到的，相反，国家政权的强力干预不利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前面所提到的拿破仑的个人军事专制就是一例。只有民主共和制的形式是有利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的政治外壳。由此可见，“四人帮”所宣扬的暴力决定一切、

政权决定一切的谬论，是完全不符合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实际的，是纯粹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其实际后果是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巨大破坏。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做了具体分析。他写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⑤恩格斯所讲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情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前些年“四人帮”把我国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沿，就是滥施暴力作用于国家经济生活的最突出的经济惩罚。当政治权力同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时，从表面上看，似乎政治权力总是处于支配地位，经济总是屈服于掌握着巨大权力的统治者或国家机器，处于被支配地位。但是，历史上的无数事例表明：当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时，在一般情况下，“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⑥拿破仑当他处在权力的顶峰时，自以为他无所不能，无往不胜，不顾一切经济后果强制整个欧洲推行大陆封锁政策，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法国的脚，激起了欧洲各民族的反拿破仑大起义，最后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和自己的垮台。同样，“四人帮”这伙当代的权力迷，自以为有权就有一切，最后也终于因滥施权力而加速自己的垮台。

四、资产阶级要在政治上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除了进行政治革命之外，还必须进行经济革命。认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革命的任务即告结束，经济的高涨就会立即自发地到来，是不符合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的。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这次革命并没有立即导致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只有在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之后，才带来了英国工业生产和贸易的空前繁荣。工业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工业革命又反作用于政治生活，带来了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议会改革和谷物法的废除，从而才保证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最后胜利。法国大革命比英国革命要激进得多，几乎是一下子就打碎了封建桎梏，尽管如此，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巩固地掌握政权也是经过了六七十年的斗争，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才取得完全的胜利的。

以上几点，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相互关系的初步探索。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表明：“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⑦无产阶级为了进行革命斗争，充分强调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因此而忽视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从而也制约着历史的发展，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的一种片面理解。过去一个时期编写世界通史教材或讲授世界通史，总是片面强调贯穿阶级斗争的红线，而往往忽视了贯穿物质生产即经济斗争的红线，甚至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地理解为革命暴力，把充满各种复杂矛盾的世界历史运动过程纳入一个超时空的暴力革命斗争的模式图，只注意研究阶级斗争的规律而忽视研究经济斗争的规律以及两种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不但使我们观察世界历史的视野变得愈来愈狭窄，而且使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论也变得愈来愈刻板 and 僵化。在一个时期内，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横行，

其理论上的谬误根源盖出于此。

这个问题并不是“四人帮”统治时期才出现的，在此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没有发展到“四人帮”那样的荒谬绝伦的程度。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却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反右斗争，人们对来自右面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十分敏感，对任何忽视或贬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的观点都毫不放松斗争，从而就为极左思潮和宁“左”勿右的思想大开方便之门。真理夸大一分就变成荒谬。这样，暴力革命万能论就打着突出阶级斗争的招牌乘虚而入，从极左的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动力学说，同时是从极左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论——从经济分析入手研究社会结构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各种矛盾。这种打扮成“最最革命”的“左”派理论，欺骗性很大，迷惑性很大，从而也较难于识别，在人们思想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四人帮”倒台以来，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在肃清“四人帮”散布的种种思想流毒和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方面取得了巨大胜利。目前这场思想斗争正在继续深化，深入到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对于世界通史教材体系的改革，不应该仅仅看成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框架问题，而应该首先看成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大问题，看成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历史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大问题，为此，单纯地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世界历史的语录是不够的，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当成套语和公式更是无济于事的，而是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开拓的崭新的世界历史观的道路继续前进。恩格斯曾告诉后起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徒：“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⑥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伟大奠基人对后辈科学工作者的无限期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科学观点重新研究全部世界历史的工作，在近一个世纪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期望和要求还是相差很远。许多旧的重大历史课题尚未进行彻底的研究，又有许多新的重大历史课题涌现出来，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引的道路勇敢地进行创造性的新的探索。本文所说到的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学说的问题，就是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由于现在已有不少同志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作者才不揣谫陋，拉杂地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的工作者来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共同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注

①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223页

②⑤⑦⑧ 同上第4卷第506、483、247、475页

③ 同上第1卷第10—14页

④ 同上第2卷第256页